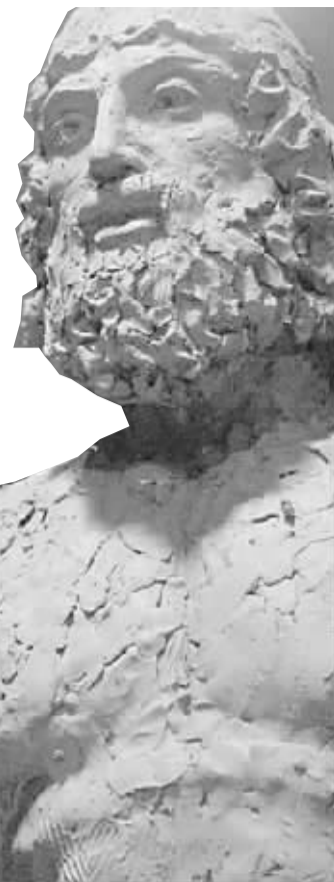


司徒安：蓝眼睛迷上“红山女神”

本报记者 毕玉才 通讯员 刘立恒 孙瑞婷



司徒安，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画家)、设计师、艺术评论家，前英国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选举委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景观方案特邀评委。英国牛津大学沃富森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现为沈阳师范大学司徒安雕塑学院院长。

从十几岁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至今已六十多年；从1984年第一次跨进中国大门，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从2000年定居北京授课至今已十余年。司徒安——这位77岁的英国老人，几乎将晚年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的事业中，足迹踏遍中国大江南北，作品安放在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门口，学生遍布中国城乡……

为“沈阳师范大学司徒安雕塑学院”和“司徒安雕塑园”的揭牌，他几乎忙到“白热化”，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司徒安教授爽朗地笑着走来时，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位77岁高龄、每天超负荷工作的老人。他精神矍铄，也很健谈。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记者深切感受到，这位老者对于中国的这份情感，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爱。

“他从不允许别人说中国一点不好，我常和他说话‘你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司徒安先生对中国的爱由来已久。他回忆说：“青少年时期，我就加入青年团，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分子，那时我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水墨画，那时候无论是在小型展览或是杂志上，到处可见徐悲鸿的奔马图，那种随意奔放的笔法让我着迷，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深深吸引着我。”

他的妻子冯向红女士告诉我们：她的先生之所以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与他所处的朋友圈子有着很大联系。

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们提起很多朋友的经历，他们都是早期的中西方艺术文化交流的大师，与中国有着渊源深厚的联系。路易·艾黎是早期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1927年来到中国，收养了5名烈士遗孤，1938年和宋庆龄、斯诺三人发起了工业合作社并担任技术顾问，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购置枪弹药，支援抗战；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抗日战争中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李约瑟是剑桥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中国妻子鲁桂珍的帮助下，撰写了近20册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

这些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搭建桥梁的朋友让司徒安羡慕不已，也是支撑司徒安坚持把中西方文化交流做下去的动力。我们称赞他说：“您做得最好。”他

笑着摇头说：“我做得不够好，但我遇到的时代最好！”

1984年，司徒安应中国对外友协和新西兰政府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邓小平语）路易·艾黎先生做肖像，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中华土地，这一趟中国之行，圆了他青少年时的梦。

从2001年起，司徒安与冯女士把生活工作的中心转向中国。

“这些年来，我们从新西兰和英国到中国之路上不仅有鲜花和掌声，也有很多艰辛和挫折，但我想为中国的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作一份贡献，我现在真的很高兴。”冯女士告诉我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放弃成熟的欧洲艺术市场和舒适的英格兰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原因。

她笑着说：“他对于中国的热爱甚至超越了我，从不允许别人说中国一点不好，我常和他说话‘你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红山女神的召唤

司徒安喜欢写实肖像，尤其是人物肖像，他对于中国古代的人物雕塑偏爱有加，非常痴迷“红山文化”，尤其是红山文化中的雕塑。

他说：“红山文化质朴、简约又充满了人性的魅力，红山女神的玉珠子眼睛凝聚着原始的智慧与美，我常想，直到现



司徒安先生(中)与中国朋友在一起。(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我们还在和五千年前的‘雕塑家’做着同样的事情，用泥巴塑人像，这是一件多么神奇而伟大的事。”

2011年5月21日，位于沈阳师范大学的司徒安雕塑园揭幕，院内包括有孔子、苏格拉底、马克思、老子组成的“哲学家园”，有蔡伦、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组成的“科学家园”，有曹雪芹、莎士比亚组成的“文学园”，有梅兰芳、贝多芬等组成的“艺术家园”，有《从雅典到北京》的“奥运精神园”，有新颖的司徒安独创的不锈钢抽象艺术“学位园”，全部由司徒安在两年内边授课边亲自完成。

司徒安告诉我们：为了创作曹雪芹雕像，他利用每日吃早餐的时间将《红楼梦》英文译著通读了好几遍。

为了创作走下神坛的孔子雕像，他通读《论语》，研究了台湾孔子第73代传人 and 现居内地的75代后辈，并到曲阜考察。为了创作走出神话的老子雕像，他深入研究了老子的《道德经》，并到老子的故乡鹿邑考察当地人的骨骼特点……

为什么要创作这些雕像，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司徒安意味深长地说：“就像五千年前的那位‘雕塑家’一样，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创作就是为了用自己的双手捕捉瞬间的美，把瞬间的美化作永恒。”他风趣地说：“如果人类的后代在千万年后，挖出我们所塑的雕像时，拂去它脸上的尘土，他们会惊叹‘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美！’”

从西方到东方，跑了77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坐落在鸟巢附近的人像雕塑群——“从雅典到北京”，吸引了中外友人的目光，赢得了广泛好评。它是唯一一组放置在中国的外国写实雕塑家作品，它的作者便是司徒安。

8个等大的写实裸体雕塑《从雅典到北京》，是司徒安先生免费为奥运创作的。那时司徒安73岁，作品是在一个食宿条件很差的工厂完成的，时值酷暑，老先生不但要忍受炎热，还要忍受蚊虫叮咬，但他毫不介意，他很高兴中国圆了百年的奥运梦，欣喜自己能为中国和奥运做点事情，每天都沉浸在创作的欢乐中。

司徒安说，8位古代奥运运动员，实为一个人的连贯动作，从起跑落地，取意于2008的“8”，象征着从雅典到北京，从起跑落地，跑了整整一百年。

这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司徒安中年时跑步的经历，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加强锻炼身体，并在纽约的马拉松比赛中得了铜牌，而北京奥运雕塑，正好圆了他的夙愿。完成这组塑像梦，他整整做了30年，而对于他一生来说，从西方到东方，跑了77年。

最敬业的“外教”

从2004年的北京到今天的沈阳，司徒安已经教授中国学生六年，他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渊博的艺术素养，给中国师生以极大的启发。雕塑具有特殊的

动手实践特征，司徒安每个教案，他都亲自演示，四个小时从来不开课堂，每堂课都是最早到、最晚走。

司徒安说：“我最大希望就是将快消失的古典写实雕塑技法在中国传承下去。”

如今，伴随着“沈阳师范大学司徒安国际雕塑学院”正式成立，“很庆幸能与师范大学结缘，很幸运能够遇见赵大学校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司徒安雕塑学院、雕塑园、学位园，圆了我多年的梦。”他高兴地说：“教书是永恒的事业，雕塑是永恒的艺术，尤其是在我向往的东方古老国度——中国，实现两者的结合是我一生的梦想！”

深谙孔孟之道的朋友

司徒安不是一般的老外，他对中国文化不但“情有独钟”，而且“造诣颇深”。提起中国的文学、哲学、绘画、甚至电视剧、饮食，他都能侃侃而谈。

他很欣赏诸子百家的哲学，他喜欢老子的顺其自然、无为旷达，这也是他自己的创作态度与人生态度。他也喜欢孔子的仁爱知礼，博采众长，对于孔子提倡的尊老爱幼、家庭观念等大大赞赏。他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如果老子在这个屋子里的话，我们可以畅怀大笑，如果孔子在的话，那就得正襟危坐。”

他的妻子这样评价司徒安：“他性格中融入了基督教的宽容，佛教的慈悲，道教的自然，儒学的友善，中西方文化造就了他包容、豁达的性格，荣也好，辱也罢，他都不会回头看。”

司徒安先生愉快地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中国艺术家是齐白石，那种随意中蕴藏的深厚功底让他佩服；他最爱看的中国电视剧是《西游记》，每个假期都会不厌其烦地看；最爱吃的中国美食是南京盐水鸭……

谈起中国文化，司徒安似乎有说不完的感受，他略带兴奋地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神奇的东方文明古国，在这里我总能得到惊喜，新的艺术、新的服装、新的美食会不断涌入我的世界，这里到处都充满活力，大家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这种活力也深深感染了我。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年轻！”

“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的一次聚会上，司徒安就预言“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当时并没引起太多人注意。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司徒安先生“得意”地说：“现在，我的很多朋友都很羡慕我在中国。”

回想1984年来中国时的情景，“都到了天安门了，我才知道这一路漆黑的街道就是北京的城中心了，满街的人都身着灰蓝色制服，用蜂窝煤取暖，露天市场只有大白菜和大葱。如果用个词形容北京那一定是‘horizontal’——平的，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夜晚，车子开到天安门广场，连一幢高层建筑也没有，我当时还以为在郊区。”“现在的中国是彩色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到处生机勃勃，人们的服饰装扮也与西方同步，发展的速度惊人！这都源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中国的未来不可估量。”

杨士林：探究泥与火的文化奥秘

本报记者 柳霞



杨士林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做文化的潜泳者；只有这样，你的艺术，你的学术才能有厚度，有分量。”

泥与火的艺术陶瓷的奥秘去了。杨士林头衔有很多，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会员，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安徽省书协理事，安徽省书法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他的经历更堪称传奇：早年弃政从文，中年潜藏不出，自甘寂寞，沉醉艺文，诗文书画考古鉴赏相互打通。同这样一位文化奇士交谈，他能够带你领略地域的广阔，体察时间的纵深，感悟文化的厚重。

要听从内心的选择

安徽凤台，地处淮河流域，是道家文化的孕育地，这里的文化到处留存着老庄思想的印记，生于此的杨士林从小便在道家文化氛围中成长。小时候，杨士林尤喜在夏天的晚上躺在打麦场上看星星：“你看那些星星有的疏可跑马，有的密不透风，而这样的布局便是大自然的美。我们的先人创作的书法艺术不正是如此吗？”他喜欢在自然中寻找最初的艺术灵感，“就像古人那样，他们离自然最近，对自然的感悟也就最深刻，最真实。”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总能触发他的思考。

到了35岁，杨士林开始聆听内心，他说，要学会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杨士林的选择就是读书、写字为业。1987年，蚌埠市成立书画院，杨士林受任主持书画院的工作，全心投入艺术创作中去了。上世纪90年代初，杨士林的一个朋友去北京看望赵朴初，带了他的册页，朴老看了册页后，给了很高评价。

随着杨士林书画技艺的不断精进，他的作品不仅在安徽名噪一时，还多次在日本、香港展出，为行内所称道。

然而，杨士林并没有激流勇进把自己的书画作品推向市场，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无论同古人还是同今人相比，他觉得自己欠缺的东西还很多，一方面是技法不够完善，有些想表达的东西表达不出来，再就是知识结构和个人修养不完善。他说，人到了一定阶段，要明白自己站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用脚步重写一部陶瓷史

中年的杨士林，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酒酣跳荡，市上呼号；诗兴癫狂，坟头拉鬼》的文句，迷恋上了郑板桥。这，正好吻合了他那时的心境，如同找到了一面镜子，比照到自己的影子。寻踪郑板桥，成了杨士林踏上学术之路的第一步。

杨士林遍读关于郑板桥的书籍与资料，仍觉不足，他认为只有踏遍郑板桥的故里和旧游之地，嗅一嗅那里的空气，方能着笔写作。杨士林从郑板桥的出生地兴化，到他潦倒居居的扬州，再到他读书的天宁寺（即今天的扬州博物馆）以及郑板桥所有为官之所，杨士林都跑了一遍，搜集了不少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两本广受欢迎的著作，一本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传》，另一本是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评传》，后来两本书都在台湾出版。有了这次的研学经历，杨士林便一发不可收拾，深深地潜游入精深异常的

中华文化之中。1992年以后，他不仅从各种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甚至也有意和艺术界保持距离。杨士林对于古代陶瓷有了一种格外的偏好，他说：“面对古人的器物，可以触摸到他们的情感，读懂他们的心。”此后二十年杨士林的生活大多围绕着窑址铺展开来，只要书上有，听说过窑址他都跑遍了。江西、河南、河北、浙江，杨士林不惧远行辛苦，单江西景德镇他就去了70余次。

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让他对书本上很多记载和学术界约定俗成的一些观点有了颠覆性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瓷器只有见于著录的才是正宗的，而杨士林调查发现，即使是战火纷飞的1948年，景德镇瓷器烧造量最少的一年，数量仍然相当可观，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有多少，民间流传的又有多少，书本的记录是远远不够的，这都尚不为世人和学界知晓。只有实地考察才能厘清他们的宝藏的烧造及蕴藏的实况。尤其是近三十年瓷器出土及流散状况，引起了他的关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郢都，那在杨士林的脚下成了现实。

杨士林偶然在一本名为《明中都》的书中看到，中都城在洪武二年至洪武八年长达六、七年营建过程中，烧造了大量琉璃及瓷砖瓦和装饰构件。杨士林判断，这段时间恰恰是元代瓷器向明代瓷器转变的阶段，于是他就带着学生去中都城寻找标本，当时还没人关注那里，当地人看到他们满地翻找瓷片，就笑话他们是捡瓦碴子。然而，就在别人的不理解中，杨士林采集到了大量标本，还在一个农民的房屋墙上发现了极为珍贵的洪武釉里红龙纹瓦当。就这样，杨士林收集了大量的瓷器标本，并出版

了《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这一着先鞭的学术著作，引起学界震动。

身处清幽，却不避忧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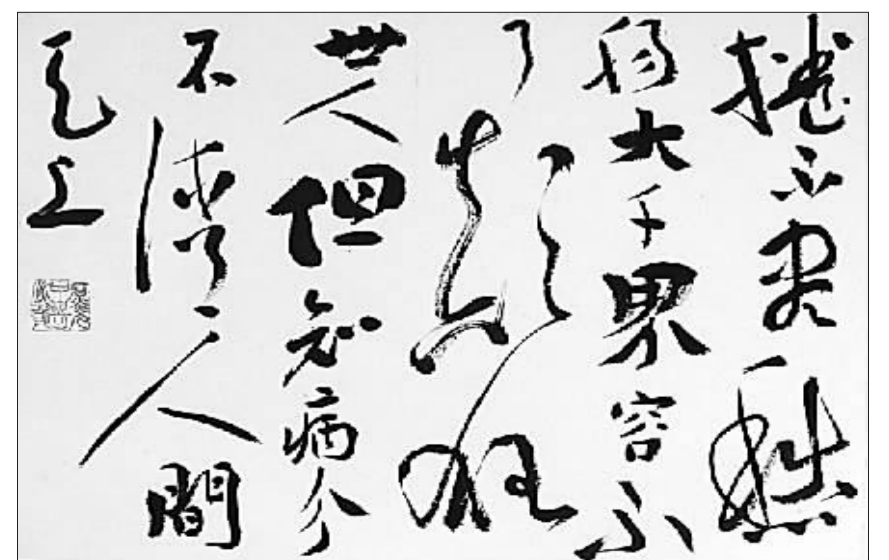
杨士林结束长达二十余年的窑址考察后，选择来到北京。在他看来，北京是一个“台风眼”，外面喧嚣异常，里面却宁静清幽。颇具“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意味。字画创作，瓷器鉴定，精研学术，杨士林每天的生活一如往常平静，但是此时的他却因为古玩市场的失范和一些人对“艺术创新”的曲解而忧心不已。

杨士林痛心的是，无休止的炒作，让艺术市场走入了迷途。在不久的一场拍卖会上，清代的瓷器价格远超宋代，乾隆年间一个官窑瓶子竟然卖到5.5亿元人民币，这个价钱可以买几卡来宋瓷！但在民国时期，一件宋瓷可以换几车清瓷，现在竟然完全颠倒了。

杨士林看到太多因为过分商品化而卖掉的作品，也看到太多忙于在市场上经营自己的艺术家。在这样的风气引导下，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水准，变成了看他的作品能

卖多少钱。“问题在于艺术品不是单纯的商品，许多一流作品被低估了，三流作品反倒卖出一流的价钱。比如说古代某一作品曾经拍出1.69亿元，其实此件作品的作者，在当时充其量也就是位三流画家。而这幅画之所以能够价值逾亿，只是因为上面有乾隆的题跋。”杨士林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炒作。对于创作者而言，会导致困惑：我们创作的原动力在哪里？是按照内心的冲动来创作，还是跟着市场的导向走？”他不断地呼唤，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

“创新”对于艺术界而言，是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是如何创新？怪相频出的艺术界，创新变成了随意发挥的理由。“很多人直接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说这是创新。也许对国内家乡父老而言是新，但是在中西方艺术的天平上，这个新就不能成立。这便要求我们从更高的水平上俯瞰。让我们的艺术有纵深感，承载更多的历史。”杨士林这么说，也这么做。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作一名文化的潜泳者：“只有这样，你的艺术，你的学术才能有厚度，有分量。”杨士林说。（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杨士林作品